

與時俱進

2011年春節牧函

金魯賢¹

這封春節牧函有二大特色：一是給廿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作了一個交代，使年輕的一代略知德、法、俄、美如何影響了世界局勢，直至廿一世紀還感受其後果，聯合國的組織就是其碩果之一。

另一特色是作者把上海教區過去半個世紀的概況生動地做出描繪，而其傳福音的心火及謙卑的態度可引發所有以福傳為職志的人，做一個很深的反省和祈禱。自問一下：我一生曾引領多少人認識主耶穌？以開放的心讀這封牧函，必會受到聖神觸動。

房志榮推薦 2011年3月18日

¹ 本文作者：金魯賢，1916年生於上海，1946年畢業於上海徐家匯神學院，隨後赴法國、德國科隆、奧地利因斯布魯克、義大利羅馬等地求學。1950年獲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學位，1951年回到中國。任徐家匯大修院（母心修院）院長、耶穌會上海區代會長，中國耶穌會代巡查使、海州監牧區代宗座監牧。1955年9月8日中共政府鎮壓行動時被捕入獄，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，又接受勞改9年。1982年獲釋，1985年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，1988年成為上海教區主教至今。

各位神父、修女、修士、教友：您們好！

我小時上學，主要是背書，其中許多我還記得，比如：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。老師解釋時說：「一天最主要的是早上時間，必須好好用功」；「一年最重要的是春天，必須好好規劃、抓緊」。一年之計在於春，我國重要的一年一次召開的兩會：人大與政協，都在年初召開，兩會的工作報告，分兩個部分：一是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，擺成績、指缺點；二是規劃未來一年的工作、制訂政策。

幾前天我收到瑞士天主教出版的 2011 年 1 月份的《選擇》雜誌，其中一篇社論是我的好友 Emonet 神父所寫，我用功讀了兩遍。文中他引用了他人的一段話，給我很大啓發，我現把它譯成中文：「昨天，我們能根據過去來判斷現在，甚至未來……今天我們卻應把未來作為出發點……」。這句話觸動了我，使我沈思了好幾天，越想越覺得此話言之有理，現寫出來和諸位分享。我無手機、無照相機、無電子計算機，最近又足不出戶，屬於孤陋寡聞之類，落後於時代，有些問題很可能你們早已知道、早已想過了。

根據過去，判斷現在，規劃未來，是靜止的觀點，認為世道不變，世事只是周而復始。我國自夏、商、周以來，四千年以農立國，把人民分成五類：士、農、工、商、兵。放在第一位的是士，士大夫即當官的和知識分子；第二農民，以下是工人、商人、兵士。農民綁在小塊土地上不動，農業：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即春天耕種、翻田、撒種，夏天不斷除草，

秋天豐收，冬天把它們貯藏起來，年年如此，周而復始，世世不變。農業如此，農民的生活相同。幾千年來，農民日出而做，日入而歸，那就是太陽升起了，農民就拿起鋤頭去田裡工作；太陽落下了，農民扛起鋤頭回家。天天如此，總之，不變。

1941年，我被派到河北獻縣教區張家莊天主堂的哲學院補讀一年哲學。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學院，師生中有法國籍、意大利籍、西班牙籍、加拿大籍、匈牙利籍以及中國人，中國人除了當地的，還有我們上海去的。當地的同學大抵沒有看到過火車。我們過的是歐式生活，有電、有自來水，冬天有暖氣，吃的是西餐。有時我去農村訪問教友，附近沒有公路，沒有公交車走過，只有土路。交通工具只有家畜拉的平板車，車輪是木製的，外箍是鐵圈而不是橡皮的，所有的車子兩輪間的距離都相同。累年積月，車輪在土路上走出的深溝，稱之為轍。中國有句老話「閉車造車，出門合轍」，就是譏諷那些不了解具體情況、憑自己想像去行事的人。關起門來造輛車，再推到路上去試車，不合車轍只能報廢。那時我在農村裡看到了泥土壘起來的房屋，了解到農民們成年吃粗糧，只有春節才吃上白麵粉做的糕，我不禁想：二十世紀了，怎麼人民過的生活還像孔子時代呢？兩千五百年不變！既然不變，從過去判斷現在似乎不會錯了。

事實證明錯了，世界一直在變，一切在動。以過去判斷現在往往是錯誤的。例子很多。最大的錯誤是法國人搞的馬其諾防線，我們都知道它所造成的損失。上個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

大戰。敵對雙方死傷幾千萬人，有士兵、有無辜農民。第一次大戰和以前一樣是平地戰，投入的是陸軍、步兵，一方採取攻勢，另一方守勢。爲了防守，士兵挖一人深的戰壕，壕溝前高堆沙袋用以擋住敵方的子彈。人站在溝內，躲在沙袋後，敵人衝來就端起槍來射擊敵人。第一次大戰的四年戰爭，最著名也最殘酷的戰場，在法國的凡爾登附近，德國王儲親自指揮，集中兵力，先以大砲猛轟法軍，然後一聲令下，指揮官身先士卒，撲向法軍，一陣掃射，德軍死亡很多，但仍英勇前進，踏著屍體繼續前進，真是前仆後繼。有時見死傷太重，只得收軍，以待增援到來，再組織進攻。有時攻下法軍防線，法軍退守第二防線，伺機反攻。這場拉鋸戰持續幾年，德軍始終不能突破法軍防線。法軍的指揮官名貝當，輿論稱之爲抗德大英雄，立下大功後封爲元帥，第一次大戰以法方爲勝利者結束。

戰爭的軍官立了功，大抵晉升了。其中名馬其諾者後來成爲法國的國防部長。他認爲戰爭實際上是壕溝戰。他認爲德法是世仇，德國一定要復仇，早晚德法還得打一仗，必須有所準備。在他腦子裡，下次戰事必定仍是壕溝戰。他就在德法邊境築一個高級壕溝。上次戰時壕溝很簡陋，臨時掘的，一人深，露天的壕溝，士兵長年累月蹲在裡面極艱辛，風吹雨打：北風吹、雪花飄時，士兵凍得發抖；夏天酷熱，太陽灼得全身冒汗，又不能洗澡；大雨傾盆時，身淋雨中，無法躲開。馬其諾等人體恤士兵，新造的馬其諾防線用鋼骨水泥，溝上有頂，子彈穿不透，砲彈炸不開，防線內有高級設備，衛生間、餐廳、放映

室、休息室，應有盡有。防線內設有輕軌，把全線連接起來，方便運輸軍火，補給也有保障。線內滿佈重量級的大砲，由於判斷敵人只有從東方來，大砲都固定，砲口都對準東方，西方是自己領土，再西是大西洋，用不著把砲口對向西方。當時法國領導認為有此防線可以高枕無憂了，只有極少數有識之士認為這條傾全國之力建造的防線保衛不了祖國。比如少將戴高樂，他寫文章說，未來戰爭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體式，必須創新造大量飛機，建立機械師團等，但他人微言輕，他只是一個副師級幹部而已，當權者沒有理睬他。最近我看到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丁肇中說的一句話：「在科學技術領域中，是多數人應服從少數人！」這話說得真好。

1939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，雙方對波蘭宣戰，瓜分波蘭，法國與波蘭是同盟國，即與德國宣戰。法國政府下總動員令，把大部分軍隊駐入馬其諾防線內。馬其諾防線築在法德邊界上，往北去法國與比利時接壤，因為比利時是中立國且世世代代與法國友好，馬其諾防線到此為止，沒有往北推進。戰爭初期，德國不攻法國，西線無戰事。法軍待在馬其諾豪華壕溝內，無事可做，閒得發慌而抱怨說：這是場無聊的戰爭。1940年6月，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東線精銳軍隊，調過頭來撲向比利時，占領比利時後立即向法國挺進：上千架飛機亂轟，下面機械部隊勇猛前進。這一戰法國措手不及，勉強應對，節節敗退，很快德軍進入巴黎，立即揮師南下，長驅直入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在馬其諾腹背方向進攻，馬其諾一切設施都指

向東部，沒有想到德軍從背後抄來，無法應戰，一百五十萬精兵全部落入德軍手中，成爲俘虜。馬其諾將軍原以爲，以他的傑作，馬其諾防線可保法國安全百年而流芳百世，卻由於只知過去不知未來，反而遺臭萬年。

這時法國政府全體出逃辭職，請抗德老英雄貝當元帥出山，收拾殘局。貝當見到軍隊精兵已被俘，殘軍又潰散，認爲法國失敗已成定局，無法挽救，只得投降成爲法奸。憑著過去來治理現在，規劃未來，會導致錯誤、損失。馬其諾防線是個很典型的例子，對法國人來說，教訓是沈重的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衆所周知，世界上基本上分成兩個陣容，一個以美國爲首，一個以蘇聯爲首。兩個超級大國一直在明爭暗鬥，美國本土自身從未受過戰爭的破壞，經濟結構平衡，國強民富。蘇聯卻遭受戰爭的巨大損失，但由於歷代領導重點抓重工業，抓軍火生產，核彈雖稍微落後於美國，航空技術卻超越美國，第一個送人上太空。我們看來，兩方勢均力敵。美國里根總統上台，謀士們獻計說，要勝過蘇聯，必須大力擴張，研製新式武器，我們有足夠的財力支持這方面的競賽。我們這樣做，蘇聯必將傾全國之力，企圖追趕我們，但他們底子較薄，經濟結構失衡，他們重視重工業，忽視輕工業，不把改善人民生活作重點，兩方競賽，日子久了，他們無力以繼，我們仍然強壯，他們必將失敗。不出謀士預料，幾年後蘇聯解體。憑經驗，治理現在，令人失敗，多一旁證。

寫到這裡，我不禁讚頌我國領導的英明。他們沒有用「凡

是」來治國，而是銳意糾左，重視改善民生，大力提倡創新，穩妥推進體制改革。各行各業在與時俱進，在今天國際激烈競爭之中，我國立於不敗之地，中國人民幸甚。

實際，根據未來判斷現在，身邊的例子很多，何必去外國尋找呢？比如象棋，我國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都會下，當然棋術有高底之分，一般棋手，你下一棋，他立即回棋，這是根據過去判斷現在。高手一般不立即回手，手中拿著棋子思索，人稱舉棋不定，他思索看對手將下什麼棋，不只看一步，要看下兩步、三步，再決定自己下什麼。這是根據未來判斷現在，看得越遠越高明，越有勝利的把握。

上面是我牧函的引言，寫得太長了。以下，我將注意力放在天主教上。

天主教起源於巴勒斯坦，這塊彈丸小地，儘管遭到當局全力反對，仍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傳播於地中海沿岸，接著使整個歐洲及西亞皈依基督，以後又傳到北非、東亞、南美洲和北美洲，總體發展過程是可觀的。但實事求是地說，也有失誤、坐失良機的方面。

天主教長期扎根於農村。天主教主要信徒是農民，整個歐洲教堂密佈於各個小村小鎮，村鎮都以教堂為中心。教堂既是恭敬天主的聖地，又是村民們相互聯繫的社交場所。堂的西側往往有一學校，東側是公墓，嬰兒出生，父母抱之去聖堂領洗，小兒長大後就送他們去教堂旁的學校念書，大了在教堂結婚，死後埋在教堂旁的公墓內。主日教徒參與了彌撒順便去父母墓

前獻花祈禱。這樣代代相傳一千多年不變，教堂乃教友之家。意大利文 domo 一詞即指家，也指教堂。

然而世界會變，不斷在變，人們尚不知不覺，卻變了。有時變得很快，蒸氣機發明以後，工業革新，大地主變大資本家，資本家在城市郊區蓋起工廠，大量製作商品，吸引了農村青年和強勞動力棄農去工廠當工人，工廠建設在離市中心遠的郊區，工人住在資本家蓋的簡陋宿舍裡，農村的本堂看著教友離鄉背井外出打工感到無奈，不去追問，不去了解，不去關心；城市本堂神父堅守自己的陣地，不去照顧不屬於他的管轄區的外來工，於是工人們成爲無牧之羊。資本家唯利是圖，只顧賺錢，盡力剝削工人，工人每天勞動十小時、十二小時，生了小孩無精力管教照顧，小孩得不到呵護，長大了又無錢進學校，流落在街頭；略微長大後，爲了幫助父母，去工廠當童工。教會不存在於工人中間，但酒店、妓院、賭場應運而生，他們把工人們賺得的薄薄工資騙走，工人成爲赤貧。

初階段他們不會團結鬥爭，沒有工會指導幫助，過牛馬般的生活。工人們仇恨資本家，仇恨貴族，也漸漸仇恨教會，教會當局只看過去，不看變化，忽視了新興的工人階級，失去了大批信徒。一直到二十世紀初，一批年輕司鐸對工人懷有愛心，也看到了工人的力量，立志爲工人服務，把工人爭取過來。他們認爲不能說空話，必須有行動，他們下工廠當工人，和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，和工人們打成一片，也和工人一起上街遊行，向資本家抗爭，爭取工人應得的權利，這就觸犯了資本家。

他們就向主教們施加壓力，說司鐸們當工人失去司鐸們的身分，他們上街遊行，更是投向共產黨，參加政治活動，為共產黨助長聲勢。有些主教，比如當時巴黎大主教支持工人司鐸運動，資本家就組織起來，向庇護十二世教宗上書，請他下令禁止司鐸下工廠當工人，庇護十二世即下令扼殺了這項運動，令有識之士感慨萬分。當時大部分教會領導的作風，是靜止的，不是動態的，往往憑過去判斷現在，不是看未來判斷現在，於是喪失良機。當知道：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啊！

再說一件事，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，發生了司鐸們對青少年和兒童進行性侵犯的事件，媒體大加宣傳，對教會口誅筆伐，譴責教會，甚至有人要把教宗訴之法庭等。這類罪行自古有之，教會只把它當作一般犯第六誡的大罪，不夠重視，往往告知被害者不要聲張，把犯罪的司鐸調往他地工作，以此掩蓋醜聞。過去的當局忘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有劣跡的司鐸，去了新地點，仍犯同樣的罪。教會沿用老法處理現在的問題，殊不知社會在變，世界在變，價值觀念、道德準則，一切在變。猥褻兒童的罪行，不可饒恕的罪行，必須繩之以法，使其不再侵犯其他青少年。教會沒有與時俱進，受到廣大輿論的壓力後，才知道公怒難平，才祭出新的處理辦法，但晚了，很被動了，受到巨大的損害。

現在來說說上海教區。1951年教區遵守上海軍管會的命令，向政府詳細登記財產，共有大小聖堂三百九十餘所（不包括崇明島）。當時交通不便，我幼年時回老家，浦東沒有汽車，沒

有人力車，只有獨輪車，所以每隔三、五里就有一所教堂。文革時期全部沒收挪爲他用；三中全會後，政府撥亂反正，重新落實宗教政策，恢復宗教活動，歸還教堂。1982年我回上海時，教區已有五所教堂，1988年張家樹主教去世時，開放的教堂已有三十所，我接任後，仍致力於重建教堂，今有一百四十八所，由於交通發達，已完全夠用。

上世紀九〇年代初，我去德國訪問時，特去 Rottenburg 教區拜會 Walter Kasper 主教（他後來去羅馬，爲宗座合一委員會主任，升爲樞機，今已榮休），他和我會談時，對我說：「金主教，您辦事業，我支持；您要建造聖堂，我分文不給。」我說：「對我們中國教會來說，修建聖堂是頭等大事。」他說：「現在我們德國教會，所有教區都在變賣教堂，聖堂少了，進堂教友少了，教區都在收縮，不出三十或四十年，您們也將賣教堂，既然不久將出售，何必今天蓋呀？」我說：「我們中國教會絕不會賣聖堂。」這位主教很固執，他對上海教區的事業、修會、光啓社、光啓培訓中心都捐了錢，對蓋教堂就是分文不給。我們那次談話在上世紀九〇年代初，已過了二十年，從前年起我有些擔憂，深怕那位主教的話，也會發生於我國。

去年刑主教交給我 2009 年教區各堂口行施聖事賬。說老實話，這賬單沒有給我帶來喜樂，只帶來了憂慮。整個教區領洗者 1641 人，死亡者 1038 人，說明教區只增加 603 位新教友，我們教區有 83 位神父，平均每位神父一年才爲天主貢獻新基督徒 20 位，諸位想想這是喜訊嗎？這就是上海教區福傳的成果。

我看了細賬，發現一個堂區本堂神父整個一年，沒有付洗過。耶穌那時向門徒們說：「往訓萬民，給他們付洗」，宗徒們走到天涯海角宣傳福音為人授洗。我想這位神父一年幹了些什麼？他守住幾所聖堂不傳福音，不勸人入教，他有病嗎？但他有一個優點，就是老實填表，沒有虛報。1945年上海教區教友（不包括崇明）為十萬，六十二年過去了，先後出生了三代人，今日仍只十餘萬。1949年基督教在上海二萬多，現已二十多萬，我們大家得檢討吧！

今天我收到教區負責修堂的吳高森神父的報告，2010年上海教區用於修堂的費用，佔教區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。諸位，這是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？我不反對造新堂，但投入應與用途相配不是嗎？有的神父向我說：「有些新蓋的聖堂，他一月只去一到兩次獻彌撒，其餘日子教堂是空關著」。其實，神父在時大抵是門雖設而常關。神父早上做完彌撒，退到自己房間內，關門不接見教友，有些教友心中有苦，想向天主傾訴，堂門緊緊關著；有些好奇人士想參觀了解一下天主教，叩門求進，無人開門。耶穌在世時親自去各處宣傳福音，我們司鐸為第二基督，我們不關心福傳，難道不怕將來基督不承認我們？

我虛歲已九十又六，隨時準備天主召叫我，私審判時天主將說：「我給了你好多元寶，其中包括長壽與傑出的助手，以及良好的工作條件，你報上你的成績吧！」也許我將說：「主呀！我蓋了好多聖堂。」天主會打斷我的話說：「這是次要的，我要的並不是鋼骨水泥修成的物質建築，我要的是人，活生生

的人，他們是我的子女，他們是新的耶路撒冷。你勸了多少人皈依我的聖子，你為窮人服務了嗎？窮人才是我的代表，我賞賜你過富裕的生活，你想到無家可歸、有病無處就醫、想上學而不能付學費的窮人了嗎？依我看來，你稱不上一個合格的管家。」我聽了無言可對，感到無地自容。

今年年初，教區幾位總鐸開了一個教務會議，討論教區一年中應做的大事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呀！」會後艾副主教把開會的總結報告交给了我，共兩份，一份是一年中應修的房屋。另一份與教務無關，不必提它。這次重要的年初會議，隻字未提如何在新的一年中開展福傳工作。看後，我向天主做了檢討，我沒有領導好天主託給我的司鐸，因此他們關心的仍是屬世的一切，而不是屬神的一切。他們沒有注意未來，只注意現在。

時代變了，政策變了，政府提倡發展城鎮，要農村也城鎮化，上海快速響應，上海約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極少部分是農村，已城鄉一片，再過二十年也許上海沒有了農村，沒有了務農的工人，現在留在農村的人，只是些老、弱、病、殘。將來呢？農村戶口會消失嗎？農民流入市區、鎮區，這是大趨勢。

田愿想神父向我說：「上海有許多溫州人在打工，其中有天主教友，有些人主動找他，教友找神父真是好現象。」田神父又說：「據他所知，上海溫州教友最少有一千五百人。找他的約五百人，只是少數。」我想，溫州有那麼多教友來上海，那麼山東、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四川、貴州來的，

有多少人呢？在上海的外來工約有五百萬之多，如果說其中百分之一是教友，就是五萬；如果說百分之二，就有十萬。等於上海多了十萬弟兄。在市區、在鎮區工作的神父們，你們應高興，天主交給你們那麼多的羊群，應當感謝天主。那麼，不要只顧上海的老教友，自己應把部分精力放在外來工身上。應組織教友去尋找、照顧這些新弟兄，領他們來教堂。春節就到，請他們與你們分享快樂，大多數可能已回家探親，過了元宵節他們會回來，不能讓他們有被教會遺忘、遺棄的感覺，讓他們親身體會到教會確實是一家，教友確實是兄弟姐妹。

馬達欽神父來見我，交談中他說道：「創業不易，守成也不易，如要守成，必須創新」。要保守過去的成就，必須著眼於未來，才能做好現在的工作。

與時俱進，展望未來，就是我這篇文章的主題。春節到了，我敬向諸位祝賀：

新春愉快，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，
福傳有成，羊群大增，主寵日隆！

金魯賢

2011年春節前夕